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研究所

马 克 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 丕 坤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马 克 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 丕 坤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112,000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000

书号 1001·1167 定价 0.40元

目 录

序 言	1—4
[第一手稿]	5—57
工资	5
资本的利润	17
地租	30
[异化劳动]	42
[第二手稿]	58—65
[私有财产的关系]	58
[第三手稿]	66—133
[私有财产和劳动]	66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70
[需要、生产和分工]	85
[货币]	103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	109
注 释	134—146
译后记	147—14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¹

序 言

|| XXXIX |²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³。当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我发觉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起来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这样会使阐述受到妨碍并造成理解的困难。此外，需要探讨的题目是如此丰富多采，以致要把这全部材料塞到一本著作里去，就只能采用纯警句式的体裁，而这种体裁的叙述又会造成一种任意建立体系的印象。因此，我打算相继用几本各自独立的小册子来分别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而以一本单独的著作作为结束，来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最后，再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⁴。基于这个理由，关于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本书只在国民经济学本身所 *ex professo* [份内] 应该涉及的范围以内加以涉及。

对于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我用不着再来保证，我的结论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完全经验的分析得出的。

〈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批评家⁵则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彻底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仅是法的，而且是

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麻麻的群众性的群众”、“替群众性的群众代言的代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迎头痛击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象这样的批评家还需要首先拿出证据来，以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事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①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我还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⁶。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的内容丰富而又富于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以外，只有赫斯收入文集《二十一印张》中的几篇论文⁷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⁸；而在《德法年鉴》上，我也曾极其概括地提示过本书的要点⁹。

〈除了这些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一般的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是全赖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的。然而，有些人出于小气的嫉妒，另一些人出于真正的愤怒，显然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收入《软文集》中的《哲学改造纲要》¹⁰——尽管这两部著作被偷偷地利用着——策划了一个蓄意使它们湮没无闻的真正阴谋。〉

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¹¹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无声无息，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实在、深刻、广泛而持久，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依我看来，本书的最后一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分析，跟当今批判的神学家的意见相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② || XL | 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们必然是不彻底

① 尖括号中的话在手稿中都是划去了的。——编者注

② 正文中方括号里的字是译者为了便于理解加上去的。——译者注

的，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也毕竟是神学家，从而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一定哲学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和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便怯懦地、不正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而他在这些前提面前的奴颜婢膝以及他对这种奴颜婢膝的懊恼，现在则只是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说只是消极地和无意识地表现出来，是由于他或者不断地反复保证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或者为了使读者和自己本身看不到对批判及其诞生地——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德国哲学——进行论辩的必要性，看不到现代批判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性的必要性，而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批判所要对付的只是自己之外的某种狭隘的批判形式（譬如说，十八世纪的批判形式）和群众的局限性。最后，当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本质的发现——如费尔巴哈的发现——被做出时，批判的神学家就制造一种假象，仿佛这些发现正是他自己做出的。他是这样来制造这种假象的：由于他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因而他一方面把这些发现的成果以口号的形式向那些还处于[黑格尔]哲学束缚下的作家掷去；另一方面，他以一种诡秘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弄黑格尔辩证法的诸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而这些要素是他在这一批判中还没有发现的，并且这些要素也还没有以经过批判改造的形式供他使用。他既未打算也没有能力把这些要素同批判正确地结合起来，而只是神秘地以黑格尔辩证法所固有的那种形式来搬弄这些要素。例如，他提出[黑格尔的]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反对[费尔巴哈的]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借以自欺欺人地表明自己的水平甚至超越于这些发现。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为了使它能够侈谈批判的纯粹性、彻底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

判等等，哲学应该随心所欲地做到一切，乃是完全自然的事；而当他一旦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环节为费尔巴哈所缺少时，他就自诩为哲学的真正克服者，因为，尽管神学的批判家如此沉湎于对“自我意识”和“精神”的唯灵论的偶像崇拜，却终究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而达到意识。>

深入地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运动之初曾经确实是一个进步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结蒂不过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的被丑化成神学漫画的顶点和归结罢了。神学自来就是哲学的痼疾；现在又叫它去演示哲学的消极分解、亦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因果报应，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述。¹²

<反之，费尔巴哈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何等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跟哲学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一事成为必要，关于这一点，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 |XL||

[第一手稿]¹³

工 资

|| I |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是属于资本家的。资本家没有劳动者，要比劳动者没有资本家活得更为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习以为常的并且是有效果的，劳动者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且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还可以把产业收益加到自己的收入里去，而劳动者则除了劳动所得以外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劳动者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劳动者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可以不必安于这种分离，而劳动者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此，对劳动者说来，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劳动者在他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和为使劳动种族不致死绝而额外给他的聊足赡养家族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是适合于“光杆的人”¹⁴、亦即适合于畜类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资。

象其他一切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着人的生产。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劳动者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此，劳动者的生存被贬低为其他一切商品的存在的条件。劳动者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算是他的幸运了。劳动者的生存所依赖的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的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

就会低于价格；结果，构成价格的相应部分就会离开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劳动者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由于劳动者对资本家处于从属地位，吃亏的首先总是劳动者。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劳动者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能够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这种能力，使得被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劳动者或者失去生路，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 II | 市场价格的偶然而急遽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要比对那个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为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为小。情况往往是这样：在某一个地方工资提高的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工资保持不变，而在第三个地方则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劳动者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则劳动者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工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产的有利位置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时，劳动者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的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形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劳动需求的减少而降低，因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因此，二者互相抵消。但是，总有一部分劳动者失去生路。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劳动需求的增长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的下落而降低。因此，二者互相抵消。

劳动者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劳动者的劳动价格之差，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之差大得多。劳动时表现出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因此所得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资本则总是迈着同样的

步子，根本不管个人活动的实际特点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在劳动者和资本家同样遭到损失时，劳动者苦恼的是他的生存本身，而资本家则苦恼的是他的死钱财的赢利。

劳动者不仅要为物质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得职业，亦即要为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所可能有的三种主要的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劳动者在这些状态中所处的地位。

(1) 如果社会财富处于减退的状态，那么劳动者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下劳动者阶级也不能象所有者阶级那样得到好处，“没有一个阶级象劳动者阶级那样，因社会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¹⁵。

|| III | (2) 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唯一对劳动者有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者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是想多赚几个钱，他们就越是不得不牺牲更多的时间，以致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这就缩短了劳动者的寿命。劳动者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劳动者阶级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断地产生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这个阶级总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日益富裕的状态呢？那就是在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α) 通过大量劳动的积累，因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从而，通过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剥夺，通过他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与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和活动的资料越来越

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

(β)资本的积累扩大着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劳动者的人数;反过来说,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扩大着分工,同时分工又增加着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这种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者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而且是极其片面的、机械式的特定劳动。随着劳动者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 IV | 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的增加,劳动者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随之降低。在工厂制度下,劳动者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γ)在福利正在增长的社会里,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的利息过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企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因此,资本家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资本的积聚日益增长,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过去的资本家沦为劳动者阶级,而劳动者阶级则由于这种人数的增长一方面又要饱尝工资降低之苦,同时也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随着资本家人数的减少,他们为争夺劳动者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劳动者则由于人数的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反常和更带有强迫性。因此,劳动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要陷于行乞或饿死的状态,正象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要下降到劳动者的地位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劳动者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者也不能避免劳伤、早死、沦为机器和资本奴隶(资本的积累是作为某种危害他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的)、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劳动者的饿死或乞讨。

|| V | 工资的提高在劳动者身上引起资本家式的发财欲,但是

劳动者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因此，随着工资的提高，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劳动者相对立。同样地，分工使劳动者日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引起人们的竞争，而且引起机器的竞争。由于劳动者沦为机器，所以机器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象资本的积累导致工业数量的增加，从而也导致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也生产出更多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结果不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就是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劳动者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日益增长、累进的状态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这种繁荣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劳动者的处境会是怎样的呢？

(3)“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里，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是极低的。劳动者间为谋得职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致使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现有劳动者数的程度，而因为该国的人口已非常稠密，所以人口数已不能再增加。”¹⁶

超过这个数目的增长部分将注定死亡。

因此，在社会衰落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日益加剧的贫困；在社会福利增进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错综复杂的贫困；在社会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持续不断的贫困。

|| VI |然而，既然在斯密看来，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不是幸福的¹⁷，——而实际上甚至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都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既然国民经济学(整个私人利益社会)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社会的不幸。

关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还应该指出，工资的提高对

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缩减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资本利息的增加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前者是作为单利发生影响，而后者是作为复利发生影响¹⁸。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这位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按照他的看法把劳动者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并且按照理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说，实际上劳动者得到的是他绝对不可缺少的最小一部分产品，也就是说，只得他不是为了人而是作为劳动者的生存，以及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了繁衍劳动者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份。

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是同时他又说，劳动者不仅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本身和自己作为人的资格。

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所得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忙碌碌的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的利息，而摊到劳动者名下的那一份则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他有四个孩子，也注定要有两个饿死。

|| VII |¹⁹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能够用来增大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的、不变的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但是按照同一个国民经济学的意见，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凭着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资格，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和优游岁月的神仙，可是他们却到处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对劳动者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是物的唯一的、不变的价格；然而同时却再没有任何东西象劳动价格那样具有偶然性并且处于激烈的波动之中。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和文明，然而却使劳

劳动者陷于贫困以致沦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然而却使劳动者日益依附于资本家，加剧劳动者间的竞争，把劳动者拖到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去；而接着生产过剩而来的则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者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同社会利益相对立，然而实际上社会却总是必定同劳动者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同社会利益相对立，（1）是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从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缩减和上述其他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是因为对社会来说产品总量就是纯产品，而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但是，依我来说，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议论本身得出的结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 * *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一个扣除额。然而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所让予劳动者的扣除额，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劳动者、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下，劳动者遭受的痛苦最为深重。他由于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地位而遭到特别沉重的压迫，同时由于社会的这种状态而遭到一般的压迫。

而在社会前进的状态下，劳动者的沦落和贫困化则是他的劳动和他所生产的财富的产物。换言之，贫困来自当今的劳动本身的本质。

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这个毕竟可以大体上实现的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劳动者说来却是持续不断的贫困。

不消说，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亦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而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能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只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因此，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从上文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探索下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1)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 改良主义者或者为了改善劳动者阶级的处境而希望提高工资，或者（象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 en détail [具体地说来] 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以赚钱活动的形式出现。

* * *

|| VIII | “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的预备训练的职
业，整个说来是变得比较有利的；而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很快学会的那
种机械而单调的工作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能不降
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还占最大多数。因此，如果说第
一类劳动者现在的工资为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劳动者的工资和五十年前
一样，那么二者所得的工资平均起来当然为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
家里，属于第一类劳动者的只有一千人，而属于第二类的有一百万人，那么就
有九十九万九千人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更好，而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
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可是人们却想借助于这种肤浅的平

计算，在有关人口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的多少只是估计劳动者的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衡量劳动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然而这种持续性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日长短的差别。最近二十五年来，亦即恰恰从棉纺织工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时起，这一工业部门的英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而增加到IX|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或多或少总要影响到其他地方。”（舒耳茨：《生产的运动》，第65页²⁰）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增长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说法是正确的，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因而贫富之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激烈。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增长了，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而需要、欲望和要求也同样提高了，所以虽然绝对的贫困在减少，相对的贫困却可能增加。靠海豹油和腐臭了的鱼过活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需要着同样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生产总量在十年中间按人口平均计算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前进着的国家里，工资赚得和十年前一样多的劳动者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生活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了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是看作劳动的动物，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做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的身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因为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劳动者往往可以完成过去一百甚至二百五十到三百个劳动者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发生了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X|帮助人类的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所必要的时间和人的耗费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况下，提供给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也同时相应地增加了。但是，我们从老克罗斯斯^①那里、甚至在他所固有的领域中所夺得的卤获物，在

^① 克罗斯斯系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父，宇宙的统治者。从他那里夺得的卤获物当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赢得的时间。——译者注